

半山絕句

金陵即事

水際柴門一

照影無窮如

烏塘

烏塘渺如綠

風何處好香

午枕

梁启超：中国传记发展史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者

大家小傳

梁启超◎著

梁啟超

传记 菁华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梁启超◎著

梁启超 传记菁华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传记菁华 / 梁启超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12
(大家小传)

ISBN 978-7-5060-7816-0

I. ①梁… II. ①梁… III. ①人物—列传—中国 IV. ①K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7123 号

梁启超传记菁华

(LIANG QICHAO ZHUANJI JINGHUA)

作 者: 梁启超

责任编辑: 张凌云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5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816-0

定 价: 30.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出版说明

传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亦史亦文，宜读宜赏，滥觞于《史记》之“列传”，后为中国历代史籍及文集所承续和繁衍。

近代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现代传记进入中国，故有所谓“传记文学”，为胡适首倡，梁启超、林语堂、朱东润等发扬光大之，作传之风遂盛行，其中尤以名人大家为名人所作传记最为人所称道。基于此，我们曾策划出版过一系列名人传记，包括“名人名传”系列、“名人回忆录”系列等，颇为业内人士及读者认同。

我们回头审视这一出版历程，蓦然发现，我们忽视了一种更值得珍视，也更适合现代人阅读的传记形式，即所谓“小传”。

小传者，古已有之，如李商隐之《李贺小传》、陆游之《姚平仲小传》、朱国桢之《黄山人小传》等，俱是千古佳作。近代以来，作传之风既盛，小传亦颇多，其中称得上绝妙好文者，又有梁启超之《亡友夏穗卿先生》、鲁迅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胡适之《记辜鸿铭》等。察古观今，考其特点，小传其优善者有二：

一曰“小中见大”。

一曰“妙趣横生”。

小传之优正在其小。其篇幅短，其用语精，其写作手法绝类小品文，于传主生平中仅取一事、甚或一语，便得以将其一生运命中最具个性的一面加以张扬，令人印象深刻。此其所谓“妙趣横生”。

小传之妙又在其趣。大传“写实”，小传“写意”。只寥寥几笔，

略作点染，便足以使读者观其影，聆其声，感其情，加之相当一部分是写身边人身边事，故而别具一种活泼泼的生动色彩，读来如叙家常，亲切可爱。较之一般细述生平之大传，反而更易为人所接受，亦更有阅读价值。此其所谓“妙趣横生”。

况以今日生活之快节奏，一般人阅读时间之被挤压，如何使读者在最少时间内吸收更多内容，获得更多阅读愉悦，是出版业不能不承担之责任，也是不能不考虑之现实。从此种意义考量，小传之小，小传之趣，实最为读者便。

然近世以来，小传之多，几成泛滥。问：如何拣选？答曰：选名人大家所作小传，选名人大家为名人所作小传。

名人大家所作小传，其文笔佳，其用意深，读者从中所得意趣亦较他人所作为多。

名人大家为名人所作小传，其叙事实，其情感真。一时代之名人，所交接者亦多为名人，此自是不言而喻。然名人为名人作传，不特因作者与传主之亲近、熟悉，更在于其笔下所凝结之情感也真，其光环感也少。

是为本丛书之说明。

近代传记的新变

夏晓虹

在近现代出版史上，梁启超撰写于二十世纪初的多种传记，曾经独立于文集，数次结集行世。如果考虑到当年避难日本的梁氏本以政论家闻名海内外，则其史传文之不受时事影响，甚而至于历久弥新，便是一殊堪玩味的现象。

历数梁启超传记文的写作，1901年实为关节点。这一年的12月，《南海康先生传》与《李鸿章》先后脱稿。次年2月，《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对传记的著述兴趣一发而不可收，笔涉的人物也从同时代扩展到西方近世及清以前。在梁氏1903年2月离日游美以前，《新民丛报》的“传记”栏全部由其包揽，接连刊发了《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1904年4月，梁启超重新主持《新民丛报》后（此时刊物出版脱期），不仅续写完《克林威尔传》，又新成《（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及《（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最后一文刊载于1905年5月第69号杂志上，该刊的“传记”栏亦自此收场。其实，除去离开日本期间，曾由他人填补空白，此外，《新民丛报》的“传记”栏确可视为梁启超的专栏。而栏目的取消并不是其传记写作生涯的终结。1908与1909年，他又有《王荆公》与《管子传》二著问世，且王安石一传的篇幅，在梁氏所有著作中也属空前巨制。尚应提及的是，梁作西方伟人传大多凭借日本著译本，中国古今人物传记则

是自出机杼，理应获得更多重视。

梁启超对传记体的迷恋，在《管子传》的成书上表现最为充分。先有广州汤学智应《新民丛报》征文撰写了《管子传》，此文尽管被评为第一名（甲等），但1903年2月在该刊发表时，已非本来面目。原因是这篇被梁氏许为“搜辑甚勤，不胜钦佩”的传文，仍让他感到美中不足，“嫌其意义有所未尽”。于是，竟不容分说，夺过汤氏之笔，越俎代庖。自己虽谦称是“偶奋笔为之订改”，实则是“滔滔不能自休，遂至改原稿十之六七”。末了还要自我开脱，说：“非敢有意点窜高文，窃附‘赏奇析疑’之义云尔。”要求“作者谅之”（《新民丛报》第25号“新年大附录一”为“悬赏征文披露”所作说明）。远在广东的汤学智是否原谅梁氏的擅自斧削增润，不得而知；不过，改动过半的文章再冠以汤名，既不符实，也颇有强加于人之势。为此，1904年，梁启超重掌《新民丛报》后出版的第46—48号合刊，在登载《本社告白》，向读者许愿将续刊因总撰述梁氏出游而中断的连载篇目时，《管子传》后面便没有像其他各目一样系属作者——那确实已不能算作汤学智之文。只是，这续成的诺言5年后才兑现，已刊的部分也作了大修订。如此，经16日写成的《管子传》，便可当之无愧地归入任公先生名下了。

实际上，梁启超的传记书写史并非以《南海康先生传》开篇。即使发表于戊戌前的《记江西康女士》《记东侠》《三先生传》以其简略，可以忽略；而1898年9月底亡命日本后，陆续在《清议报》连载、随后成书的《戊戌政变记》，却已含有日后影响甚大的《殉难六烈士传》。只是，从传记体裁的演变看，此六传仍可归入《史记》以来的纪传传统。虽然因作者与各传主均有交谊，可更多通过对话刻画人物；但一些并无第三者在场的密谈，仍写得口吻逼肖。如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著名一幕：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

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当谭说出杀荣禄之计后——

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谭嗣同传》）

此事经过虽有谭嗣同可为梁传达，但传文之绘声绘色、如临其境，更是得自太史公笔法。《史记》之擅长以人物语言（包括对话与独白）复原历史场景，刻画人物性格，久已在人耳目。其所采取的全知叙事立场，也使得司马迁对笔下人物具有绝对的知情权。在这一点上，梁作与之如出一辙。至于六烈士传每篇均先书传主名号、里籍，末缀以论评，也一本《史记》开创的列传体例。在梁启超，借用庄重的正史体裁应当还有一份深意，即不申私情，单凭公义，六烈士亦该名垂青史。

尽管《殉难六烈士传》在梁启超的传记文中知名度最高，不过，就梁本人的创作史而言，此传的意义主要在于演示其袭用传统纪传体式所能够达到的辉煌。接下来，这位趋新好奇的文章家开始转官换调。东渡日本后耳濡目染、广泛阅读的新式传记——评传，很快出现在其笔下。《南海康先生传》就是新装登场的首次成功演出。

与谭嗣同、康广仁诸传不同，模拟口吻、增加现场感的对话已从康有为传中彻底消失。论交往之久，康之收梁为弟子还在梁结识诸人前，可记录的言行应当更多。而梁启超之舍此取彼，宁愿站在史家的客观立场处理史料，意在昭示其自觉疏离犹带小说笔意的旧传体式。

限于康传乃是为纪念《清议报》出版100期赶写的专稿，与独立发行的著作有别，梁启超故未详述其撰写体例。仅在结尾处引用英国

首相克林威尔斥责画家之言“Paint me as I am”，“盖恶画师之谀己，而告以勿失吾真相也。”以表示自己不溢美、不讳恶、公正如实的著述态度。这一名言以后屡次为梁征引，“自信不至为克林威尔所呵”（《南海康先生传》；又，《李鸿章·序例》中亦有此言），也成为其传记完成时的自负之言。

以“四十八点钟”写成的《南海康先生传》，无疑因采用新体，带给梁启超极大的兴奋，这才会有其后续一气呵成的《李鸿章》。二作篇幅虽不相等，但其分章结构与著述笔调大致趋同。康传首尾的《时势与人物》《人物及其价值》，相当于李传的《绪论》与《结论》，均先提出人物评价标准，最后为其人在历史上定位。中间的章节，康传先分期记述传主生平，再集中数章讨论其教育、宗教、哲学、政治思想，结构可称经纬分明；李传则直接以事功为人物履历的分段标识，真正做到了经纬交织。如此写法，在中国传记史上实为空前之举。

在《李鸿章》篇首的《序例》中，梁启超虽攀比司马迁，称“夹叙夹论，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并举《史记》中伯夷、屈原、货殖诸列传为例；批评“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才造成了“凡记载一人事迹者”，“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的陈套。但其实梁氏心中很明白，其以《南海康先生传》发端的新体传记，不只和单一叙事的“中国旧文体”截然不同；即使被他高自标举、“窃附斯义”的《史记·伯夷列传》，仅比较结构，二者也相去甚远。因此，康、李诸传应该另有源头。这就是《李鸿章·序例》第一条所点明的“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叙述人物“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此种体式即为今日已然风行的评传。

新式评传既以议论成分大增区别于旧体传文，自然为政论家梁启超提供了特别的便利。读《南海康先生传》以下各篇，你会感觉，梁氏运用此体格外得心应手，似乎评传这一体式天生是为他创造的。篇中那些随处流露的作者识见，实为其传记中最吸引人的“文眼”。尤其因为梁氏强烈的现实感与启蒙心态，使所写各传也以熔铸新思想、

新知识见长，而充溢着对旧史正统意识的批判精神。仅以重在发明政术的《管子传》与《王荆公》二书为例。前著第一章《叙论》开篇即云：

今天下言治术者，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曰国家思想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经济竞争也，曰帝国主义也。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新萌芽而新发达者。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曰惟有此之故；中国人所以弱于天下者，曰惟无此之故。中国人果无此乎？曰恶，是何言？吾见吾中国人之发达是而萌芽是，有更先于欧美者。谓余不信，请语管子。

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

如此浸淫时代意识的立说，很容易拉近读者与作为传主的古人之间的辽远距离。而《王荆公》中对于历史上一向被推崇的宋代名臣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尽管也承认“其道德、学问、文章，皆类足以照耀千古；其立朝也，则于调燮宫廷，补拾阙漏”，亦有可观；重点却放在批评诸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当此内忧外患煎迫之时，其于起积衰而厝国于久安，盖未之克任”（第二章）。这些论断又使他与旧史拉开了距离。

当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院讲学时，曾自出心得，教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有关“专传”（即评传）的部分，更近乎夫子自道。其言曰：

我的理想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

并强调说明：“此种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就是因为梁氏的用心在借人物为历史写照，故要求“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

论一：人的专史”第一章）来做传。梁本人所写的传记，也无一例外，均以关系到一代时局者为主人公。《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即是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李鸿章·序例》）。同样，《袁崇焕传》之冠以“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也是由于在作者眼中，袁氏属于那种“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袁崇焕传》第一节）。可以说，人物一生行事与国家命运、朝代更替或民族前途息息相关，是梁氏选择为之立传的首要标准。

以梁启超创立新史学的眼光，兼之本人的流亡政治家身份，又使其传记写作自然地偏向为历史翻案一类。金兆梓即发现，梁氏的中国历史人物传所写之人，“班定远而外，类皆旧日治史者所不屑道”，且多有恶名，如管子的“器小”，王安石的“奸邪”，郑和为“奄竖”，张骞也“以凿空见病”（《梁著六种重版序》）。梁启超却别具只眼，别有情怀。作《管子传》，叹息“吾国人数千年来崇拜管子者，不少概见，而訾訾之者反倍蓰焉”；写《王荆公》，又称“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因国人之“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祐、绍兴之时”（见各书第一章）。梁氏于是自觉义不容辞，一一为之洗净旧史家泼上的污垢，还原并提示出人物的伟大之处。

按照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的定义，凡属人物，即可分为“先时”与“应时”两类：

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

出于对亲身经历的中国近代史的关切，梁氏虽曾选取“时势所造之英雄”李鸿章笔之于书，但其著述热情显然更集注在“先时人物”身上。因为在他看来，后者对历史的贡献更大：“为社会计，则与其得十

百应时之人物，无宁得一二先时之人物。”这样，人类社会可以进步更快。统观这些先驱者，梁氏指出，其“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但也正因为超越了所处时代，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绝域，血溅市朝”。此语不仅可用以状写梁启超所崇敬的王安石、袁崇焕，即在其师友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身上，也得到了应验。而为历史算总账，梁启超又坚信：“凡真人物者，必得最后之战胜者也。”（《南海康先生传》第一章）这些对传记人物命运的解说，其实也适用于作者本人。当年正亡命天涯的梁启超，何尝不是以“先时人物”自居？截取他最喜欢的《自励二首》中句，所谓“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其二），其心事不正与传中人物相通？

而梁启超一枝“常带情感”、“别有一种魔力”（《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节中的自述）的生花妙笔，则使其笔下人物一如作者之元气淋漓。透过梁氏以史家客观态度征引、考辨的大量文献，这些千古人物仍各具鲜活的个性与读者靛面。如《袁崇焕传》引余大成《剖肝录》，述袁氏虽被清人施反间计下狱，终以国事为重，手书招回受其蒙冤之惊吓而叛逃的部将祖大寿：“骑出书。寿下马捧泣，一军尽哭，遂踊跃即日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袁崇焕尽管含冤而死，清军却因袁部下仍为明战守不得不议和，退回关外。梁启超评以：“盖督师一纸书，犹足以却敌也如此！”感慨良深。而袁之孤忠报国、“浑身担荷、彻里承当”（第九至十一节），亦跃然纸上。梁氏的同歌同哭、感同身受，自易于引领读者进入历史现场。也即是说，在其所推崇的“德”“学”“识”“才”这“史家的四长”（《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外，梁启超还能以“情”动人。其所作诸传之所以迭次翻印、历久不衰，这应该也是其中的一大“秘诀”。

在梁启超为古今人物所作诸种传记之外，尚有1902年底撰写的

《三十自述》一篇值得单独一表。此文乃是专为其第一部文编《饮冰室文集》而作。而由列于《史记》卷末的《太史公自序》开创的自传书写，亦成为史传中的一体，历来为文人、史家看重。此一传统对梁氏自具魅力，不过，具体到该篇的写作近因，却与其亡友谭嗣同的《三十自纪》相关。孔子自述学思经历，有“三十而立”之言。谭氏也以三十为分界，将其著作区别为“三十以前旧学”与“三十以后新学”，用以标志学术、思想的巨变。梁启超在三十之年尽管并无如此斩然的断裂，但其由“帖括”“训诂”“词章”之学到西学的依次转变，以及从公车上书、强学会、《时务报》主笔、湖南新政、百日维新，到流亡日本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并游历夏威夷的诸般经历，已足够丰富多彩。借“而立”之机作一人生小结，亦很恰当。日后，胡适遗憾于梁启超未能听从其劝说动笔作自传，“中国近世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因为“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的生活呢”（《四十自述·自序》）。胡适因此及早开始写他的《四十自述》，梁启超则幸好尚留下了这篇浸染情感魔力的《三十自述》。

进入民国以后，梁启超已不再有长篇传记写作。不过，与此前的文言撰述不同，1924年所作《亡友夏穗卿先生》出之以畅达的白话，是个例外。夏曾佑是梁启超早年的知交，梁文称其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全篇即从这两个角度展开，将三十年前二人交往论学中的精彩华章剪辑成文：

我们（按：尚包括谭嗣同）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

这会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那里会有这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

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

这样一种意气风发的思想解放状态，至今读来仍令人神往。虽然梁启超表示将来打算作夏曾佑传，详细说明其学术，未能实现，但有此一篇精神毕现的忆述传世，已足以让这位早被社会遗忘的晚清思想界革命先驱，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

梁启超所著传记集的出版情况大略如下：其赴美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四篇传记，即张謇与班超合传，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罗兰夫人三传，1903年首次由上海广智书局辑为《中西伟人传》印行。1911年，《王荆公》与《管子传》亦被同一书局编入《中国六大政治家》书中，分列第一编与第五编。

1936年，梁启超遗著《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集》两部）40册由中华书局在上海出版，同时抽印《专集》中原刊于《新民丛报》的传记，分题为《中国伟人传五种》（其中《（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作者署名“慧广”，非梁作）、《外国伟人传四种》，与《管子传》《王荆公》并行于世。

1943年，金兆梓又在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择取《管子传》《王荆公》与《中国伟人传五种》，列入“梁著六种重版”目中，由已迁渝的中华书局推出。与以前诸版不同，此次重印本改用了新式标点。

以上所述仅为梁作较集中的出版行为，而由各书局单册选印者尚不计在内。如果考虑到传记单行本以外，梁启超的文章尚以《饮冰室文集》《饮冰室丛著》《饮冰室合集》等诸多名目不断编辑出版，集中大都亦包含传记，则其史传文字读者之众已可想而知。

近年来，重印梁著各传又成为出版界的新时尚，其传记文受读书界之欢迎以及生命力之长久，于此再次得到了证明。

2001年11月19日于京北西三旗

2014年12月17日补写于香港中文大学寓所

三十自述	/ 001
管子传	/ 007
张博望班定远合传	/ 095
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 113
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	/ 123
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	/ 147
李鸿章传	/ 153
南海康先生传	/ 245
亡友夏穗卿先生	/ 275
殉难六烈士传	/ 281
编后记	/ 297

三十自述

“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东海道汽车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揽镜据鞍，能无悲惭？擎一既结集其文，复欲为作小传。余谢之曰：“若某之行谊经历，曾何足有记载之一值。若必不获已者，则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谭浏阳曾作《三十自纪》，吾毋宁效颦焉。”作《三十自述》。

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十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沉崖山，留悲愤之纪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乡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强，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其江口列岛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顾闻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于阴德，力耕所获，一粟一帛，辄以分惠诸族党之无告者。王父讳维清，字镜泉，为郡生员，例选广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宝瑛，字莲涧，夙教授于乡里。母氏赵。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生

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及见之孙八人，而爱余尤甚。三岁仲弟启勋生，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嫌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至今诵此语不敢忘。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母赵恭人见背，以四弟之产难也，余方游学省会，而时无轮船，奔丧归乡，已不获亲含殓，终天之恨，莫此为甚。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己丑年十七，举于乡，主考为李尚书端棻、王镇江仁堪。年十八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挈与偕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